

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

主编 马春山 副主编 齐士义 王之春

辽宁大学出版社

《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文林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春山	王之春	王昭江	王喜坤
田丽艳	刘文林	刘仲凯	齐士义
关百忠	张乃杰	苏存	陈宝林
孟庆先	郑海章	周森	郭占卿
高国军	黄明	裴君	赫墨林

总 纂 王之春

编 辑 刘立平 姜传国

大兴金融科研之风

(代序)

1996年是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年,也是金融理论与实践活动取得明显成果的一年.在这短短的一年中,辽宁省金融学会和辽宁省金融研究所,组织全省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进行金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大兴金融科研之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针对经济金融各方面,各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探讨。

《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一书,集1995年~1996年辽宁省金融科研成果之精华于一册,是全省广大金融工作者特别是金融科研工作者孜孜不倦从事金融科研工作的结晶,也是全省金融科研工作兴旺繁荣的体现.它通卷体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求实、务实精神,是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应用,研究与指导相结合的楷模。

《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一书并非某一个或某几个人所著,而是以科研课题的形式由十几个课题组共同承担和完成的,避免了一方之论、一家之言的局限和片面,比较全面、系统地对金融领域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科学地、客观的分析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符合实际、操作性较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一书之作者层次较高,是由省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雄厚理论基础的金融专家组成的作者群,他们当中有的置身金融战线的前沿,问题看得准,体会最深,最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有的多年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工作,站得高,看得远,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把握问题的关键,研究问题有广度、有深度。

金融改革还在深入,面临的新课题颇多。全省金融工作者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继续广泛开展金融理论和政策研究。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学习、研究、借鉴国外金融创新的成果,使我国金融事业有个更大的发展。

大兴金融科研之风,这是繁荣金融事业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呼唤。愿有更多的金融科研成果展现在全省人民面前。

刘文林

一九九七年八月

目 录

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研究·····	(1)
治理通货膨胀 促进经济发展 ·····	(21)
通货膨胀问题探讨 ·····	(27)
利率市场化研究 ·····	(36)
关于按经济区域设置我国中央银行机构的研究 ·····	(43)
基层人民银行转换职能的动向及趋势研究 ·····	(51)
金融法规建设与依法监管问题研究 ·····	(61)
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	(71)
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现实选择 ·····	(83)
关于农业发展银行设立基层机构的构想 ·····	(96)
论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及其防范·····	(103)
重新构筑贷款分配结构提高贷款分配效益·····	(120)
从自控管理到风险营销·····	(130)
论商业银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137)
论如何构筑适合于城市发展的建行机构网络体系·····	(146)
关于融资问题的浅析·····	(158)
广筹资金 加大投入 加快经济发展·····	(164)
完善我国高科技投资的金融支撑体系·····	(171)
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179)
中国信托业发展研究探讨·····	(190)
关于发展我国信托业的若干思考·····	(199)

进一步发展我国信托业的构想·····	(209)
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金融改革的关系及 相关对策选择·····	(21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金融对策研究·····	(225)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金融对策·····	(234)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金融对策·····	(244)
重塑银企关系促进信贷资金良性循环·····	(251)
依法规范操作 保护银行资产·····	(259)
对海城市企业改制情况的分析与探讨·····	(268)
小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金融思考·····	(276)
试论改善企业破产外部环境的必要性及对策·····	(283)
企业破产银行信贷资产保障的探讨与研究·····	(291)
规范企业破产行为保护银行资产·····	(300)
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 改善管理 健康有序地 开展对朝边境贸易·····	(309)

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个国家各种经济矛盾的综合反映,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世界上任何国家政府都非常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这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首要任务。我国改革开放 16 年来,总的看,物价上升幅度还是比较低的,只是近几年出现了物价涨幅过高的新情况,对人民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群众反映强烈。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为此,我们必须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对症下药,采取可行性措施,把通货膨胀压低到最低限度。

一、仍在推动通货膨胀的原有因素

改革开放 16 年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个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1979 年—1980 年,1985 年—1988 年和 1993 年以来),在这三个时期中,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高速增长带给通货膨胀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588 亿元增长到 1990 年的 17,6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 8.8%。但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 1978 年价格为 100,到 1990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到 208,年平均递增 6.3%。这表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并存的。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两者之

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如下传导关系带动通货膨胀率提高。改革以来,我国的居民人均消费需求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成正比例,比例系数大体为 0.5。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用于食品方面支出的绝对额会不断增加,但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恩格尔系数)会不断下降。一般讲,收入水平低的居民相对应的恩格尔系数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不断降低,我国近 10 多年来的情况基本符合这个规律,恩格尔系数由 1978 年的 0.66 下降到 1985 年的 0.56。以后几年一直徘徊在 0.55 左右。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均食品供应量不断增加,那么恩格尔系数并不能随着消费支出的增加而降低。之所以 1978 年—1985 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主要是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有较大的增长,由 319 公斤增加到 393 公斤。1985 年以后,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人均食品供应量增长缓慢,因而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也比较缓慢。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增长速度不会过快。所以到本世纪末,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会超过 400 公斤,因而我国居民的消费恩格尔系数不会低于 0.5。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人均食品供应量增长缓慢,食品需求与食品供给的不同步增长必然导致食品价格不断上升。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公斤粮食所对应的食品支出增长率与食品价格增长率之比大体为 1:0.9,也就是说,如果每公斤粮食所对应的食品支出增长 100%,那么食品价格就要上升约 90%;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食品消费,如果食品价格上升 10%,即使其他消费的价格不变,消费物价总水平也要上升 5%。事实上,由于食品价格的上升,生活费用增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广义工资,包括奖金、各种补贴等)。工资增加带动工资成本上升,工资成本上升使劳务费用及工业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食品供需缺口的扩大,食品价格上升,导致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农产品的边际成本来增加粮食供应

量。粮食价格上升会通过农产品内部比价关系导致其他农产品(如棉、麻、油等产品)价格上升,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价格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产品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从而推动物价总水平上升。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根据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要求,经济发展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即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仍保持1978年到1990年的速度,即每年递增7.2%,那么经济增长通过以上介绍的传递关系,将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为7.7%。通货膨胀率就是6.2%。1992年—1994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年均12.7%,通过以上传递关系,其导致的通货膨胀为10.2%。

2、通货膨胀压力在经济转轨时期的释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整个经济已开始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然而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高度扭曲。在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要求价格接近价值,在生产、投资以及消费品的资源分配上,价格仍起主要作用。相对价格变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一项内容,然而,这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价格的职能将发生根本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价格在资源分配上不起重要作用或者说起很小的作用。价格只在资源动员上充当重要工具。政府控制的价格,构成了现代工业的高价格,高额利润是从农业、矿产业和大多数劳务价格都很低的条件下获得的。这种高度扭曲的价格结构使国家积累的大部分来源于国营现代工业,这部分积累创造的财政收入列入了国家预算。这部分资金除了用于政府各部门开支外,主要用于投资,其占社会总投资的绝大部分。这样,投资资金的投向和多少完全由政府控制,与价格水平不发生关系,价格的高低主要替代税收作用,决定利润分配的多少,并起资源动员作用。当我国经济全

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价格体系必将放弃其作为资源动员主要工具的旧职能,同时赋予其为资源分配主要决定因素的新职能,当价格接近稀缺品的价值时,现代工业的高额利润将随之消失,这就造成如下问题:一是在价格放开时要创立新的税收制度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为此,从1994年开始我国全面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以期以此来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从一年来的运行情况看,就单纯的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一点来说,税改应该说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就消灭财政赤字和防止通货膨胀而言,其作用远没有达到。1994年国家预算草案安排的财政赤字仍高达669亿元,是1993年的3.26倍。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实行分税制使企业负担增加了,这些税赋无疑要转移到产品价格上去,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进而造成通货膨胀;二是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现代工业利润率降低。其结果是预算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内的比重下降,并出现长期的财政困难,使其无力向企业进行投入,再加上企业利润减少,造成大批国营经济都靠大量借贷度日,结果必然要增加信贷投放,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又一根源;三是由于价格上涨的刚性,价格相对变动只能向上变而不能向下变,所以说价格的相对变动可以直接引起通货膨胀。

3、增发货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自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控制住以后,我国的货币发行一直处于超经济发行状态。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银行贷款增长率为17.6%,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实际增长7.9%,超经济发行近4个百分点;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2%,银行信贷名义增长率为22.2%,实际增长率为16.5%,超增长幅度扩大到11.3个百分点;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7%,银行信贷名义增长率约19%,实际增长率约为13%,超增长幅度约8个百分点。一般来说,贷款增幅应与社会总产品名义增长相适应,如超出当年社会总产品名义增长,则成为对社会总产品价格水平上涨的压力。根据1983年—1989年

资料计算,大体上每超发1个百分点贷款,影响社会总产品价格指数上升0.35—0.4个百分点。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按这一规律上升,但实质上由货币超量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减少。因为要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需做到:①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支持效益好的企业;②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开支,压缩财政赤字,缓解由于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和借支形成的增发货币压力;③调整信贷资金结构,加速信贷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这样,随着结构和效益状况的改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得到缓解。但是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第一,结构调整遇到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刚性”障碍而难以推进,已投入资源的重新配置组合困难重重,增量调整如同杯水车薪且不断被扭曲的存量结构所“同化”;第二,企业效益不断下降,既减少财政利税收入,又增加了财政开支;第三,产品库存积压不断增加,不但没有加速资金周转,反而使资金作用效益进一步降低。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旧病未除,又添新病。1992年以来,货币供给增长一直很快。1992年—1994年 M_0 年增长率分别高达36.45%、35.3%和24.3%,其年末余额占GNP的比重分别高达18.08%、18.69%、16.64%,两项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货币供给量的超常增长,给原有的通货膨胀压力上增加了新的重量,而这种压力最终在近期爆发出来,形成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动力。

4、财政赤字仍在不断增加。据统计,1986年—1992年,财政赤字累计2,113.3亿元。从1991年起财政赤字已突破400亿元大关。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10%。国际上一般认为,适当的赤字(软赤字)规模的警戒线为: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2%,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0%,而我国1992年以来的赤字规模超过警戒线,这无

疑会造成通货膨胀。

二、推动本次通货膨胀的新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危险期,由于经济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目前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与前几次产生的通货膨胀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财政赤字增加仍然是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直接原因,但造成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却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财政支出不合理转向了目前的财政减收与支出不合理并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我国加工工业长期存在的垄断高价,基础产业和农业的长期低价并存的局面被打破,整个加工工业的利润率大大下降。而在旧体制下,国家的积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现代工业的利润下降,不可避免的牵动国家积累(财政收入)的下降,这是造成财政赤字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是财政支出不合理,其主要表现在:①企业亏损补贴所占比重过高,从所占比重看,有些年份甚至与基本建设支出持平,1980年占财政总支出的16.6%,1990年、1991年分别占14.3%、11.8%,1993年仍为7.7%。近年虽有所降低但仍显过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不少亏损企业,以政策性亏损掩盖大量的经营性亏损。由此不仅使这些企业缺乏扭亏转盈的积极性,而且使那些本来盈利的企业缺乏增加盈利的动力,稍遇不利的经营环境,便要求补贴,结果经济效益越来越低。②价格补贴增长过快。从1979年的79.2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296.2亿元。可是近几年包揽过多的补贴(仅1993年就占财政总支出的5.6%),不仅丧失了它应有的调节作用,而且成为财政不堪重负的包袱。③行政管理费的急剧膨胀。1993年比1978年增长了11倍,即从1978年的49亿元猛增到1993年的540亿元,年平均增

长 24.4%，行政管理费的急剧膨胀，不仅挤占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建设费等支出项目，而且给整个社会的超前消费和高消费起诱导作用，同时还滋长了奢侈腐败的歪风。造成财政支出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①支出的安排缺乏科学的依据。由于理论界很少进一步探讨在当前形势下，究竟哪些是主要的支出项目必须优先保证；哪些项目是比较次要的，可以灵活安排。结果，该保证的得不到保证，而该压缩的却一涨再涨；②支出结构的协调与控制缺乏有效的手段。为实现财政平衡和经济稳定，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紧缩开支，但每一次压缩支出，基本建设投资总是首当其冲。多年的压缩使基建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已由 1980 年的 30.1% 下降到 1991 年的 16.9%，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基本建设支出的缩减在一定程度上是配合经济调整的结果，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在于基本建设支出是着眼于经济长远发展的，如果大幅度地缩减，必然影响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协调，近几年财政在协调产业结构中显得力不从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用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所致；③财政支出与非财政支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一些可以由部门、单位或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然由财政统包统揽，由于财政支出与非财政支出界限不清，为一些部门和单位将部分非财政支出挤入财政支出开了方便之门，如名目繁多的民间性学会、协会及其它非常设机构，其开支大多通过各种途径挤入行政费。此外，卫生、治安、赞助等支出也纷纷挤入行政费和事业费中。更有甚者，连请客送礼的支出也挤入财政支出；④财政支出约束软化、管理弱化，导致支出结构的扭曲。以行政经费的膨胀为例，据统计，目前全国地、市、县党政机构的总数量已超过中央规定设置的 20% 以上，“七五”期间因机构人员膨胀而使行政经费开支增加 28 亿元，约占行政经费增加额的 1/4。“八五”期间我国虽对党政机构进行缩减，但效果并不理想。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使压缩财政支出成为一句空话，在财政减收的同

时,不能做到财政减支,财政赤字成为不可避免。

2、货币投放过多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又一直接原因,但造成货币投放过多的原因却发生了变化,由现代工业信贷需求过猛转向现代工业信贷需求与乡镇企业信贷需求同时膨胀的局面。随着价格体制改革和工业品价格的放开,现代工业的利润率下降,企业的亏损面大量增加,再加上财政出现危机,无力向企业投入,造成了大批国营经济都需要超量借贷度日,这必然要增加信贷投入,形成信用膨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约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数字比1978年—1987年10年中所转移的5,670多万农村劳动力还多一倍。这些农村劳动力主要靠发展乡镇企业来消化,但发展乡镇企业需要占用大量的资金和自然资源,这将加剧需求膨胀和资金供求矛盾,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一个潜在因素。近几年,乡镇企业总资产中有50%以上是靠债务形成,而银行贷款又占乡镇企业总负债的40%以上。按照1978年—1987年我国安排的农村剩余劳力5,670万人,同期仅农村信用社发放的乡镇企业贷款(还不包括国家银行的贷款)增加额347.2亿元推算,要安排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力就业,至少需要投资612亿元的信贷资金(如加上国家银行贷款,这数字恐怕要翻一番)。这对于在原本资金已严重短缺的银行信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需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听凭乡镇企业和现代工业争夺资金、自然资源的矛盾发展,那么到头来很可能将面临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消除经济二元结构的步履缓慢,要么被迫走上增发钞票的歧路。

3、居民消费需求与农产品供给的矛盾日益显露,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当前农业形势和农产品供给状况不尽如人意。首先,虽然从总体上讲,农产品供给能够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但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进入90年代以来,尚未有新的突破,粮食总产量始终在9,000亿斤左右徘徊,特别是1994年粮食比上年减产

240 亿斤,总产量再度降到9,000 亿斤以下,约为8,900 亿斤。棉花、糖料在年度之间发生波动,甚至发生了绝对数量的减少。其次,温饱之后,人们对食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优质农产品和高蛋白质食品满足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我国的肉类总产量1993 年末达3,841.5 万吨,人均32.4 公斤,比上年仅提高3 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低40% 左右,我国的奶制品1993 年末达563.7 万吨,人均4.7 公斤,比上年有所下降,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是说,我国的农产品在总量上没有大突破的前提下,在品种和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短缺。再次,受近两年经济过热影响,经济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占用了大量农田和菜地约有1,000 多万亩,菜篮子问题再度突出起来。还有,南方历来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但近年来重工轻农的倾向日益加重,南方的农业优势正在丧失。据统计,南方14 个省区市粮食比重1989 年为58%,到1993 年降为52%,由此形成南方部分地区农产品供给的短缺。从粮食进出口贸易看,已由前几年的净进口变为净出口。1987 年—1991 年平均每年进口粮食665 万吨,而从1992 年开始,转为净出口。当年净出口粮食40 万吨,1993 年猛升到570 万吨,这就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另一方面,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相应快速增长。1993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2,337 元,扣除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净增长14.7%(1978 年—1992 年平均递增速度为6.1%)。进入1994 年,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继续高速增长,必然推动以农产品食品价格为基础的物价上涨。

4、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逐渐降低是造成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投资效率与通货膨胀是呈相反方向变动的。因为,投资效率与通货膨胀都是与货币有关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导源于货币发行过多,投资效率是单位货币量所创造的效益。如果投资效率较高,社会(企业)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能取得较快或较

多的经济增长(产出),这样,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不需要超量的货币,只需要适量的货币,这就是说,在较高的投资效率下,一般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反之,投资效率较低,则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持续下去势必会导致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与投资效率的关系,通过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与较低的投资效率并存的情况可以证明,例如,1993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达13%,与此同时,投资效率极低,这表现为:①物耗逐年上升。1978年—1987年间,我国工业物耗率增长3.4%。②资金利用效益下降。以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和税收率为例,1978年分别为15.2%和24%,1984年为15%和25.1%,到1988年则降到10.5%和22.6%,大大低于历史最好水平(1986年)的24.5%和35.2%。③工资成本增加过快。1978年—1988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5.1%,而1979年—1988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9.2%(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0.9%,到1989年全国工资又较上年增长14%,国民收入仅增加3.7%,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④企业技术水平低下,企业普遍面临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的问题;产品13年才更新换代一次,而日本只要两年;技术引进与消化之比为20:1,而日本为1:10。

5、价格改革力度加大和价格调控体系不完善,也是引发这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993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价格改革力度明显加大,价格改革无疑带动了近两年全社会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应该说,这些调价措施是符合经济改革进程的,也是必要的,由此推动物价上涨或引发通货膨胀也在意料之中。问题是,在价格调整和放开之后,国家的价格调控体系不健全,由此造成的物价上涨不容忽视。目前我国生产资料30%以上、农产品价格90%左右、市场零售的商品90%以上都是市场上形成的,但我国的市场价格法规很不健全,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

价格的管理缺乏必要的手段。一些企业为了本单位的利益,随意涨价,越权提价,非法收费,哄抬物价,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中间环节大肆盘剥,是造成一些商品价格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猛涨的重要原因。

6、在这次通货膨胀中,新的成本推进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企业工资奖金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1994年由于受政府公务员工资的调整和改革,企业工资水平进一步攀升,1月份—10月份国家银行对工资及个人现金支出看,在上年增长30.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41.3%,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劳动力成本。同时助长了全社会消费基金膨胀,对通货膨胀具有双重拉动作用;二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导致加工企业的成本上升很大。如1993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5.1%,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比上年分别上涨82.7%、28.5%和48%。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成本上升28.3%,从而推动了物价上涨;三是汇率并轨导致进口成本上升。年初汇率并轨后,进口商品由财政补贴的范围大幅度压缩,关税也要按市场价计征,必然使一些进口商品或以进口商品为原料的产品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例如:化肥价格,过去按官定汇率计价,现在按并轨后汇率计价,价格便大幅度上升。而化肥价格上升必然使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上升,从而带动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汇率并轨后出口大幅度增加,利用外资增加,而相应的进口受到控制,国家增加了200多亿美元储备,相应多投放了1,700多亿人民币。这部分投放并没有相应的进口物资平衡,这也推动了物价上升。四是财税改革加重了部分企业的负担。1994年开始推行的增值税虽然从总体上不会加重企业负担,但不同企业,不同环节,情况不同。有的税负增加,有的税负减少。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虽然名义税率没增加,但由于停止执行减免税,实际上也等于增加了税负。由于价格刚性,税负减轻的企